



No. C2004015

2004-10

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从发展战略的角度考察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刘培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

No. C2004015

2004年10月8日

* 本文不代表作者所在机构的观点。

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从发展战略的角度考察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刘培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

No. C2004015

2004年10月8日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很大程度上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在分权式改革下的逻辑延伸。为了消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经济增长，必须首先彻底放弃各种形式的赶超行为，并解决传统赶超战略所遗留下来的许多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和社会负担的问题。

关键词：发展战略 自生能力 市场分割

* 本文不代表作者所在机构的观点。

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从发展战略的角度考察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刘培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很大程度上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在分权式改革下的逻辑延伸。为了消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经济增长，必须首先彻底放弃各种形式的赶超行为，并解决传统赶超战略所遗留下来的许多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和社会负担的问题。

关键词：发展战略 自生能力 市场分割

建立统一的全国大市场，是从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型所要达成的最重要目标之一。¹但是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最近组织的一项全国性的调查表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问题，仍然没有根除，在有些地方和行业，还比较严重。（李善同等 2003 a, b）商务部最近对全国 2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一次调查显示，有 20 个省市均有产品或服务遭受地区封锁的侵害，有的还十分严重。

彻底解决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问题，其意义不言而喻。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2000 年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 Young 在哈佛大学出版的《经济学季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影响的观点，认为我国改革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是由于分权式改革以及地方政府财政权责增强造成的。我们认为，分权式改革固然和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有关系，但是放眼世界，地方政府财政独立性比中国强的国家，并不鲜见。但是，这些国家的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并不像中国这样严重，甚至在那些国家中，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考察中国今天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原因，重要的是要解释，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

¹ 对于这个转型目标国内的研究者从改革初期开始即有共识，例如李剑阁（2003）写到，“消除地区壁垒，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可以说，这是我们从改革开放以来就建立起并逐步得到深化的共识”。而且，早在 1993 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就指出：要“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该《决定》还对商品市场体系、要素市场体系、价格形成机制等方面的改革，进行了系统的规划。时隔十年，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再一次指出要“完善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

财政分权和决策权力下放，导致了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这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本文的目的在于阐明，只要让地方政府承担赶超任务，或者地方政府自己发动赶超，而且，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的经济和行政权力，那么，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就是不可避免的。

全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综述有关的研究文献；第二部分，阐述赶超发展战略导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机制；第三部分，对第二部分归纳的假说，进行初步的检验。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有关研究的综述

1、早期国内的研究

对中国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研究，有不少文献。在 20 世纪 80 年代大量的报纸和杂志抨击中国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当然也提出了政策建议。但是于今看来，这些建议实在是直接针对内生结果，而不是针对外生原因的。那时为打破地区封锁而组建的各种形式的横向联合体，最终都流于形式，收效甚微。

2、新近的观点之一：中国存在严重的市场分割

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提出严格理论解释，并引起较大反响的是 Young (2000) 的论文。该文章将中国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归因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模式。Young (2000) 认为，不同步的改革，特别是改革前为了保障工业部门获取利润而扭曲的价格体系没有得到改革，意味着相应部门存在的“租金”，改革以来，为了巩固和攫取这种“租金”，各地政府设置了各种壁垒，保护产生租金的那些企业。Young (2000) 给出了三方面的经验证据来支持其假说。Young 认为中国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问题特别严重。

也有别的论文支持 Young 的假说。郑毓盛等 (2003) 论文将中国各省份 1978-2000 年期间产出的潜在损失，分解为三个经济含义明确的部分：技术效率损失、产出配置结构非最优的损失、要素配置结构非最优的损失。后两种损失就是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导致的产出损失。该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各个省份的技术效率均有比较大的改善；但是，由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导致的后两种损失，在改革以来虽然有波动，但总体趋势是上升的，特别是 1996 年以来持续上升。到 2000 年，由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导致的产出损失高达 20%。

3、新近的观点之二：中国市场分割问题并不严重

众多文献对 Young (2000) 的文章提出批评。批评的焦点并不在 Young 给出的理论假说，而在于仔细研究其给出的经验证据，或者给出另外的经验证据，来证明中国的地方保护和市

场分割问题没有 Young 理解的那么严重。比如, Park (2003)、Naughton (2000)、白重恩等 (Bai, *et al*, 2003) 等论文。

Park (2003) 用和 Young 基本一致的数据, 经过更加深入和仔细的分析, 得出了中国市场一体化程度加深的结论。

Naughton (2000) 的文章则以更多方面的经验数据论证了中国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的观点。

白重恩等 (Bai, *et al*, 2003) 的文章也认为中国工业部门在改革以来的专业化分工是在加强的, 这意味着市场分割是减弱的。我们认为, 白重恩等的论文发现的经验证据——利税率高的行业, 在地区间的专业化集中程度低, 不应该从地方保护的角度来解释。地方政府固然有积极性保护利税率高的行业, 巩固其市场地位; 但是, 政府又何尝没有动机保护利税率低下的行业呢? 利税率低下的行业, 一般而言是竞争力低下的行业。利税率高的行业或许是竞争力强的行业, 从而是不需要保护的行业。

另外, 利税率和产业在地区之间的集中程度, 或许都是某个共同因素的内生结果。比如说, 在中国资本相对稀缺的禀赋条件下, 劳动密集行业有竞争力, 而资本密集行业则没有竞争力。对比两种行业在地区之间分布的集中程度, 显然前者更加分散, 后者更加集中。

而黄季焜等 (2002) 对中国农产品市场的精细研究也表明, 中国农产品市场的整合程度是比较高的。

笔者自己的研究也发现, 目前中国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 没有郑毓盛等 (2003) 认为得那么严重。笔者 (刘培林 2004) 沿用郑毓盛等 (2003) 的方法, 分析了 2000 年中国 30 个省份 21 个两位码制造业部门的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产出损失。结果表明, 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对分析对象带来的产出损失是实际产量的 5% 左右。而且, 由于这里的分析方法并不能考虑要素和产品流动的运输成本等, 所以这 5% 的损失, 也并不能全部归因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

平新乔 (2003) 的论文分析了地方政府进行市场保护的动机, 以及保护的实际效果。该论文有一个假说是, 一个产业的劳动边际产值或者资本的边际产值越高, 则政府越有积极性通过国有资本控制来垄断这个行业, 以便获得高的全要素回报率。我们认为, 国有企业本身, 是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原因, 而很难认为是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手段和出发点。

4、进一步的评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组织的一项大面积的问卷调查表明, 中国今天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问题, 比起 10 年前减轻了。(李善同等 2003 a, b) 从我们的直观感受而言, 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而言, 经验证据不支持 Young 的假说, 而支持相反的判断。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改革以来没有遭受过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损失，也并不意味着今天的市场分割已经彻底消除。而之所以直到今天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还没有彻底根除，是因为我们直到今天为止并没有找到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根本原因，因而也就不能给出铲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正确措施。

这个问题在有关学术研究上的反映就是，没有对 Young (2000) 提出的逻辑进行深入研究。正如上述指出的那样，大部分研究对 Young (2000) 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经验证据上，即中国的市场分割问题到底多严重，但是却没有对其理论假说提出根本的挑战。事实上，我们认为，Young (2000) 的逻辑是内在一致的。我们对该文的逻辑的四点评论是：

第一，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和 90 年代早期，的确深受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之苦。从这一点来看，Young (2000) 的理论假说和经验事实是相容的。

第二，Young (2000, p1128) 的论文的结论部分给出一个判断：“新的扭曲的延续时间，比导致最初的扭曲的那些因素的延续时间，要长得多”。事实上，这个判断难以从其逻辑框架中导出来，原来扭曲价格体系造成的租金消失之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应该相应减弱，这才是 Young 应该坚持一贯的逻辑。然而不幸的是，Young 自身给出的经验证据不能够支持这个理论推论。为了避免自相矛盾，Young 在结论中武断地给出了那个判断。

第三，该文没有对其假说给出更多的普适性 (Robustness) 检验。比方说，按照 Young 的逻辑，在休克疗法下价格体系一下子放开，是不会导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但是 Young (2000) 并没有给出这方面的相应经验证据。

第四，该文的经验事实，基本上和林毅夫 (1994, 2003) 的逻辑框架相容。按照林毅夫的逻辑框架，可以引申出这样的理论推论：只要让地方政府承担赶超任务，或者地方政府自己发动赶超，而且，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的经济和行政权力，那么，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Young (2000, p.1128) 的结论部分一带而过的一句话：中国的情形“类似于拉美国家过去几十年的情形”，实际上就是对本文从林毅夫的理论中引申的推论的普适性 (Robustness) 检验。²

第五，最重要的是，Young (2000) 的动机是对渐进式改革提出批评。显然，该文是为了给华盛顿共识提供更多的理论和经验支持。但是，如果在“休克疗法”下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也存在的话，那么，Young 的批评就无法令人接受。

下面具体分析林毅夫的理论逻辑框架在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方面的含义。

二、中国的赶超战略对市场结构的影响

中国目前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既有其特定的历史根源；也有改革以来的新的现实因

² 爱因斯坦说，理论决定我们能够观察到什么。按照我们的理论推导可以预期，在休克疗法的国家，即使价格体系同时放开，仍然有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

素。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下面分别分析这两方面的因素。

1、历史根源：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

限制本地资本和自然资源的流出、限制外地劳动力和产品的流入，这些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措施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为了提高本地企业的生存和获利能力。而造成企业生存和获利能力低下的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第一，各个企业自身经营管理水平低下等方面的个性问题；第二，企业进入的产业和选择的技术不当，导致了结构性、系统性的竞争力低下的共性问题。中国目前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上述两方面的问题。而这两方面问题又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即优先发展超越自身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产业，选择超越自身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合适的资本密集技术（林毅夫等，1999；2002）。

显然，在自由、开放、充分竞争的经济中，一个企业经营、管理的好坏会影响这个企业实际的利润率水平。但是给定正常经营管理的条件下，一个企业的利润率还决定于其产业和技术选择是否得当。如果政府鼓励企业优先发展超越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产业，选择超越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合适的资本密集技术，会导致这个企业没有自生能力。也就是，这个企业的生产成本将会高于在此资本密集产业和技术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达国家的企业的企业，因此在自由、开放、充分竞争的市场中，即使这个企业的经营、管理是正常的，也不具有获取社会上可接受的预期正常利润率的能力。如果一个正常管理的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中不能获得社会可接受的预期利润率，这样的企业是不会有入为之进行投资的；即使投资后也不能持续经营，除了依靠政府的政策扶持外，这样的企业是不可能存在的（林毅夫 2002）。

新中国成立之初，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这就决定了当时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进入的产业和采用的技术结构，应该是劳动密集而不是资本密集的。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早日赶超英美，政府选择了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道路，置要素禀赋结构于不顾，凭着热情和决心，试图以几代人福利牺牲为代价，建设那些技术结构和资本密集度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生产项目。这种发展战略要求企业大量使用相对稀缺、相对昂贵的资本；少量使用相对丰富、相对便宜的劳动。因而在开放的市场中，其产品成本必然高于资本相对丰富、资本价格相对低的发达国家同类产品的成本。这就决定了我国建立的资本密集生产项目，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会没有自生能力。市场竞争的结果必然是 如果单单靠这些企业自身的力量，将难以维持生存。为了扶持这些企业，政府就要予以扶持或保护。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为了支持执行赶超任务的企业的发展，建立了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林毅夫等 1999）。下面的几种措施是三位一体体制当中的一部分：第一，扭曲相对价格体系，压低资本的相对价格，压低自然资源，特别是重工业发展需要的那些能源和初级矿产

品的价格。这种扭曲的价格体系，实际上就是 Young（2000）所论述的诱发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租金”的源泉。第二，除了必须进口的产品和设备以外，资本类产品尽可能由国内提供，以便给优先发展的重工业部门提供市场空间。这实际上是垄断市场形式的保护，成为 Young（2000）所论述的租金的第二个来源。第三，同样的资本总量下，资本密集产业吸收的劳动力数量远远不如劳动密集产业来得多，而资本密集行业的收入水平要比劳动密集行业高，人们更愿意到资本密集行业就业，所以，政府还实行就业管制。由于资本密集产业创造的就业经常不能满足当地新增就业的需要，因此，也就会有对外来劳动力进入本地劳动力市场的限制，这实际是对要素市场的干预。第四，在政府行政体系内部，建立了一套从上而下的资源配置的机构，以及规则。

改革开放之前确立的赶超战略，在改革开放以来，并没有放弃，许多已经建立起来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也就没有根除，有些问题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³。因而，对企业进行保护的需要，也就相应地仍然存在。这些因素构成了改革以来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历史根源。

2、现实因素：改革以来的新情况

2.1 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和软预算约束问题

改革开放之前国民经济效率低下，这是改革开放的出发点。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又出现了新的历史问题。最突出的是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由隐性变为显性的问题。

首先，改革之后，许多大型国有企业仍然执行赶超任务，因而仍然没有自生能力。改革之前，推行的是统收统支，企业的收益全部上缴，企业的开支全部由国家财政拨款支付，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对企业只是一个隐性的负担。1979 年以来的各种放权让利的改革使企业有自身的利益动机，尤其 1983 年的“利改税”改变了过去的“统收统支”，企业必须由自己的收益来支付自己的各项成本开支。这种情况下，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不能赚取社会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的问题，就从隐性变为显性的问题。由于企业的产业和技术选择是政府决定的，而且是政府要求企业继续在那些产业生产的，所以，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就企业来说实际上是政府施加在企业身上的一种政策性负担，这种负担可以称为战略性负担。其次，由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投资很多，但是创造的就业机会很少，政府为了满足城市居民的就业需要，经常给国有企业的一个工作岗位指派多个工人去就业，使国有企业有了许多冗员；而且，在低工资制度下，企业还要承担诸如养老、医疗等社会性政策职能。实行“利改税”，放弃了“统收统支”的政策后，冗员和养老、医疗等就成为企业为政府承担的社会性负担。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都是政府强加在企业身上的政策性负担，都会导致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导致企业相应的政策性亏损。由于政府对企业的

³ 下面详细阐述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改革以来的新问题：软预算约束。

政策性负担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政府就必须给与企业各种政策性的保护或补贴，以补偿政府的政策给企业带来的负担。但是，由于国家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国家并不确知企业的亏损有多少因素是政策性负担造成的，有多少是企业自身经营不善造成的。企业有积极性也有可能将所有的亏损都归因于政策性负担。在政府对企业的亏损负有责任，而又分不清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的情况下，就只好把所有亏损的责任都承担起来，企业因而有了“软预算约束”。在存在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必须经常给予企业各种保护、补贴，政府也就不会不干预企业的许多经营、管理决策，同时企业也不会有积极性改善经营、管理。（林毅夫等 2001）

如果在企业没有下放给地方政府的条件下，推行市场化改革，那么企业的软预算约束补贴的最终责任方，就是中央政府。但是，在企业下放，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划分经济利益和经济责任之后，地方政府就要承担起给与所属企业政策性保护和补贴的责任。因此，中国目前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之前中央政府保护赶超企业免于国际竞争的行为，在分权改革体制下的逻辑演变，演变为各省份保护当地企业免于国际和其他国内省份竞争的行为。

从这个角度看，国有企业并不是地方政府赖以控制市场的手段，而恰恰是需要保护的對象。

2.2 分权式改革以及地方政府主导的新的赶超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沿着两条线索前进：一条是给予微观的企业更多的管理、投资和收益自主权，一条是将原来中央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权利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使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决策权力，和相应的经济利益，同时，担负起不少的经济和社会责任。获得自主权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三资等非国有企业，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标，其投资方向主要集中在传统体制下受到抑制的、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非国有企业的这些投资由于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所以发展非常迅速，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客观上使得整个国民经济实质上逐渐趋向按比较优势来发展，并推动了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林毅夫等 1999）。但是，当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时，并没有伴随着发展战略的彻底转变，相反，由于不了解一个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其实是内生于其要素禀赋结构，并且由于把发达国家具有优势的产业和技术作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所奋力追求的指标（林毅夫 2002），不少地方政府延续了过去的发展战略思想，发动了程度不等的新一轮赶超。相对发达的地区想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在产业上赶超国际上先进的国家；相对落后的省份想赶超相对发达的省份。

新的赶超的一个常见例子是，各级地方政府的官员，都把延长产业链、提高当地产品的附加价值，作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事实上，一个地区的制造业是否具备精深加工的能力，不是由政府部门和官员的主观愿望决定的。当地的基础设施、技术工人队伍、工程技术力量、资金供给等客观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新的赶超只有在各种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在改革中获得了一定资源配置权力的地方政府部门,其维持既有的赶超战略下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以及发动新的赶超,所遵循的干预经济生活的机制,和中央政府发动全国性赶超所依赖的机制,基本类似。

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政策措施五花八门,比如,通过各种手段限制外地产品流入,为生产同类产品的本地企业创造垄断的市场空间;干预司法体系,偏袒本地的企业;默许、纵容、甚至和当地的企业合谋,绕过国家的产业和土地政策,给予低价的土地,上马赶超项目;凭借行政力量影响银行系统,为当地企业融通资金等(李善同等 2003 a, b)。

3、若干可检验的命题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从林毅夫等对中国传统体制和改革开放的理论逻辑框架出发,可以导出下面理论命题。

命题 1:就省份之间的比较而言,赶超特征越强的省份,其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就越严重。

命题 2:就国民经济而言,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战略逐渐转向比较优势战略,传统的三位一体经济体制的各个环节的改革都在深入,这必然伴随着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

命题 3:凡是地方政府继续执行赶超战略(具体执行赶超任务的企业可能是国有企业,也有些可能是非国有企业),且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经济和行政力量的情形下,则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就不可避免。如果地方政府是在分权式改革中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和行政力量,那么,分权式改革后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要比之前严重。

下面我们用经验证据检验这些假说。

三、命题的初步检验以及两个竞争性假说的比较

1、命题 1 的检验

为检验假说 1,需要一个度量发展战略特征的变量,以及度量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变量。林毅夫(2002)构造了一个技术选择指数(TCI)来度量发展战略的特征。刘明兴(2002)给出了中国分省分年度的几种 TCI 指数。我们选用了工业部门人均固定资产原值除以滞后一期各省实际资本密集度存量作为衡量的指标。这个指标的值越高,代表这个省的赶超的程度就越大。

度量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指标,我们采用樊纲等(2001)给出的商品市场发育程度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两个指标的加权和。权数是他们的报告中给出的(樊纲等 2001, p.140):商品市场发育程度取 0.148;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取 0.242。四川和重庆两者的指数,用各自的

地区生产总值加权求和，合并为一个省份。这是因为我们得到的 TCI 指数当中，两个省份是合在一起的。樊纲等给出的指数只有 1997-1999 三年。樊纲等 (2001) 指数取值越高，说明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

我们给出 TCI 指数和市场一体化指数之间关系的散点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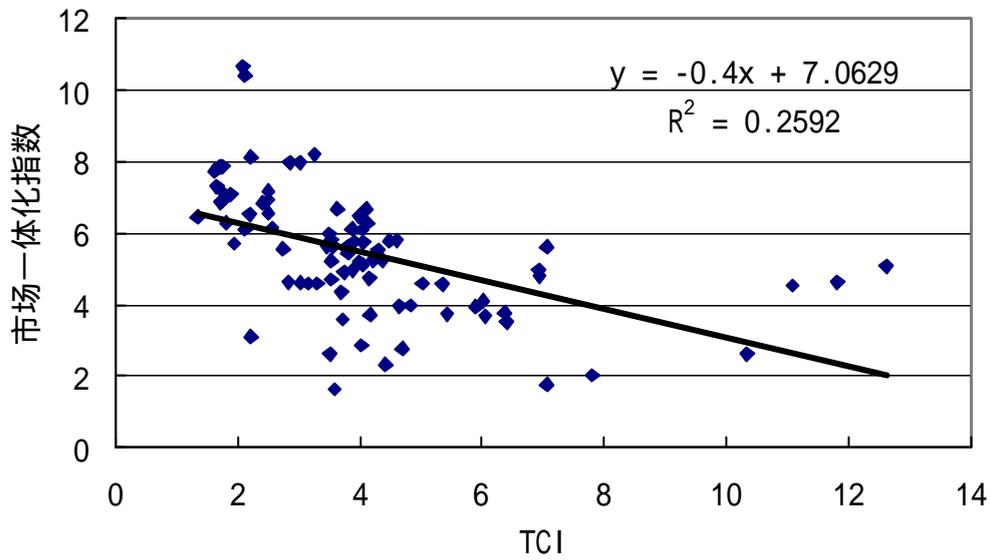


图 1：全部三年的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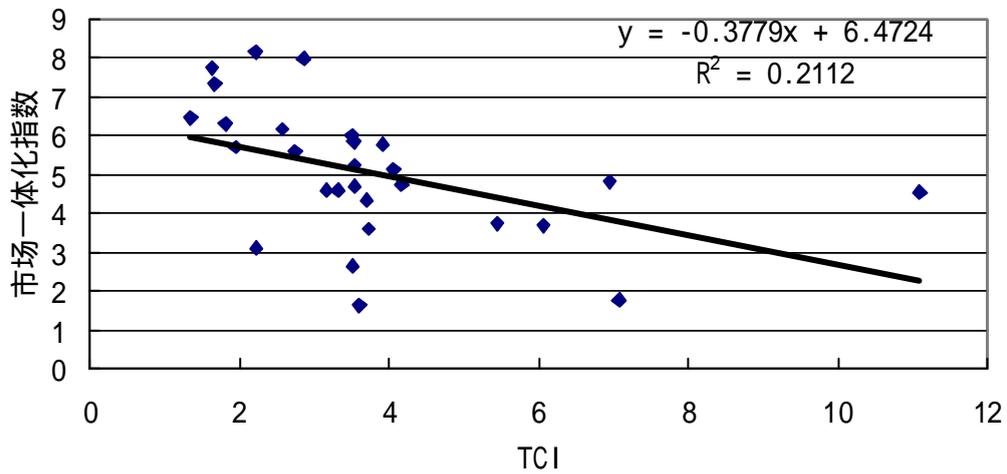


图 2：1997 年的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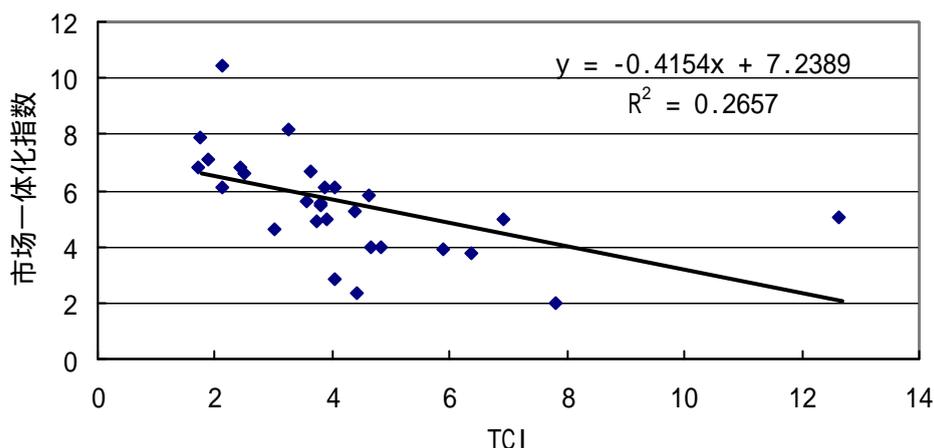


图 3：1998 年的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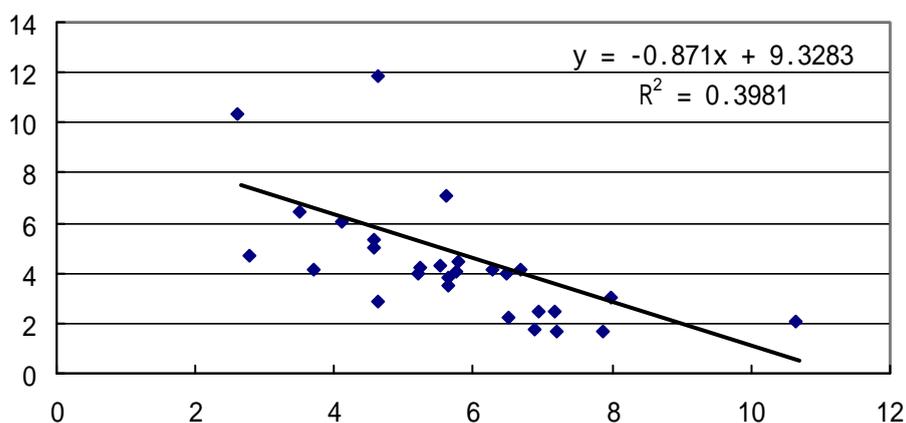


图 4：1999 年的数据

从上面的图当中可以看出，TCI 越高的省份，其市场一体化指数越低。这表明地方经济的发展战略特征，和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越是赶超的地区，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越严重。这里的证据和命题 1 相容。

Young (2000) 的论文没有就省份之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严重程度进行区分，也没有给出相应的证据。在其论文中，对中国市场分割的程度判断，是全国水平而不是省份水平上的。

2、命题 2 的检验

改革以来，中国的发展战略尽管没有彻底改变，但是，由于以放权让利的企业微观管理机制的改革为突破口，为了落实企业的自主权，改革不得不逐步推向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和

宏观的价格形成机制，而使我国的经济自觉或不自觉地越来越趋向于以市场为导向的体制。大量的非国有企业在没有享受国家保护和扶持的前提下成长起来，也使得我国的发展战略得以发生实实在在的转变。

这些事实对照于命题 2，可以推断，我国的市场一体化程度应该提高。对此，我们给出几方面的证据。

第一方面的经验证据是抽样调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03 年曾经就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问题，进行了大范围的问卷调查。问卷发放到我国全部 31 个省区市，涵盖了从农业到第三产业的各个行业。

针对企业的调查回收了 3156 份有效问卷，结果表明：“总体而言，企业认为目前地方保护程度比 20 年前减轻很多，比 10 年前略有减轻，……就是在 1994 年税制改革后到现在为止，地方保护程度总体上在不断减轻”。（李善同等 2003a，p.9-10）

表 1：当前地方保护程度和 20 及 10 年前比较的结果（%）：企业问卷

	没有答案	严重很多	较为严重	变化很小	略有减轻	减轻很多
比 20 年前	9.0	3.2	9.2	15.6	28.7	34.4
比 10 年前	9.2	2.3	6.7	20.8	35.4	25.7

资料来源：李善同等 2003a，p.10。

针对非企业机构的调查回收了 1367 份有效问卷，结果也表明地方保护程度比 20 年和 10 年前均有减轻。（李善同等 2003b，p.3-4）具体结果可见下表。

表 2：当前地方保护程度和 20 及 10 年前比较的结果（%）：非企业问卷

	没有回答	严重很多	较为严重	差不多	较为减轻	减轻很多
比 20 年前	2	3	9	10	24	52
比 10 年前	2	2	7	15	36	39

资料来源：李善同等 2003b，p.4。

第二方面的证据是，Park(2003) 和 Naughton(2000) 等论文提供的经验证据。Park(2003) 用和 Young(2000) 基本一样的数据，进行深入的分析，得到的基本结论是，改革以来中国市场一体化程度在提高。

Naughton(2000) 则用不同年份的投入产出表等数据进行分析，也得出和 Young(2000) 相反的经验判断。对此不再赘述。

对照 Young(2000) 的论文，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那样，自圆其说的逻辑应该是：如果扭曲的价格是租金进而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原因的话，那么，价格体系向市场均衡水平靠拢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应该减弱。观察中国的改革，各种商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体系

逐渐合理化，应该是一个符合事实的判断。那么，在 Young 的经验检验环节中，应该给出市场一体化程度加强的证据。但是，Young (2000) 搜集的经验证据却和这个应该坚持的逻辑不相容。所以，在其论文的结论中，只能说：“新的扭曲的延续时间，比导致最初的扭曲的那些因素的延续时间，要长得多”。但是，Young 对此并没有给出理论上的解释。

就命题 2 而言，按照林毅夫的理论框架，扭曲的价格体系是服务于赶超战略的。如果赶超战略本身得以改变的话，那么，实际上内生着对合理的价格体系的需求。从这个角度讲，Young (2000) 将扭曲的价格体系作为逻辑起点，实际上选择的并不是真正外生的原因，而只是赶超战略机制的一个内生的逻辑环节。所以，我们这里的假说，能够涵盖 Young (2000) 的假说。

3、命题 3 的检验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形，自然是命题 3 的一个直接的例证。

而中国在 1979 年的改革开放之前的几次行政性分权，所导致的结果，实际上也是和命题 3 相容的。例如，1957 年底开始的“体制下放”，根本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给“大跃进”创造体制条件。1970 年的行政性分权，出发点是为了备战，要求各个经济协作区建立能够“自己武装自己”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吴敬琏 2004，第 2 章)。当时，价格体系扭曲是存在的，所以看似支持了 Young (2000) 的假说。但是事实上，赶超和行政性分权就必然导致地区保护和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趋同。

另外，前文曾经指出，Young (2000) 提到过拉美国家过去几十年内，也存在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现象。拉美国家过去几十年内所推行的进口替代战略，实际上是一种和中国的赶超战略类似的发展战略。按照我们的逻辑，实施赶超战略的经济体，地方政府拥有自己的经济利益的条件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所以，Young (2000) 对拉美国家情形的介绍，实际上也给出了支持命题 3 的一个经验证据。

在前苏联和东欧等转型国家，即使推行激进式改革，但由于传统赶超战略下形成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和冗员等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所以，地方政府给予企业政策性保护和补贴的责任，以及预算软约束的问题依然存在。(World Bank, 2002) 地方政府给企业政策性保护或补贴是否导致以及在多么严重的程度上导致类似于中国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取决于地方政府可以动员的财政资金的富裕程度。事实上，在转轨时期，这些国家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不宽裕，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诱发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当然，这一点，还需要搜集更直接的经验证据。

俄罗斯等转轨推行激进改革的国家的情形，对于 Young (2000) 和我们归纳的理论逻辑而言，是一个关键检验。如果休克疗法下也不能避免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那么，Young (2000) 的逻辑就被证伪了。当然，如果休克疗法下，没有发生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则我

们归纳的逻辑被证伪。Gluschenko (2003) 的研究发现, 俄国粮食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在 1991 年开始进行休克疗法以后, 急剧降低, 地区间的粮食差价急剧扩大, 直到 1994 年底以后开始有所缓解, 但是一直到 2000 年底, 地区间的粮食差价还远大于能被交通运输成本的差异所解释的水平, 证明了市场分割的持续存在。所以, 俄国实行休克疗法以后的经验事实和我们的推论一致, 而不支持 Young 的逻辑。

对照本文前面对 Young (2000) 的逻辑的评论, 不难得出结论: 即使在激进式改革道路下, 俄罗斯也没有免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之害。这说明, Young 从这个角度对渐进式改革的批评, 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 正如我们一贯的观点那样, 发展战略能够以多快的速度转变, 进而企业承担的各种战略性和政策性负担能够以多快的速度解除, 决定了其他方面的改革能够以多快、多么激进的方式推进。在不转变发展战略和解决原有发展战略下所遗留给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的条件下推进激进式改革, 类似市场分割这样的问题, 仍然是不可避免的。相对于 Young (2000) 的文章而言, 这是本文对转型理论的一个贡献。

综合上述对三个理论命题的检验, 以及我们归纳的假说和 Young (2000) 的假说之间的比较, 可以得出结论: 我们归纳的假说较之 Young (2000) 的假说, 能够和更多的经验事实相容。

四、 结论

归纳上述的理论和经验分析, 可以得出结论: 违背比较优势优先发展高资本密集度的产业和技术结构的战略, 导致了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在分权式改革进程中, 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和改革后新增加的社会性负担的问题, 内生地决定了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行为。

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对中国的生产率提高, 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不仅降低了资源配置的静态效率, 而且降低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不能根除, 那么其对生产率进而对整个社会福利的影响, 不仅仅在于短期之内的增长效应 (降低增长率), 还有长期内的水平效应 (降低长期的稳态水平)。因此, 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 是我国今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一个重大任务。

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 首要的条件是放弃赶超战略和消除原有战略给予企业遗留下来的战略性和社会性政策负担。正如我们在文章当中指出的那样,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 今天的地方政府保护和市场分割行为, 实际上是原来中央政府主导的赶超战略和体制的逻辑延伸。所以, 中央政府彻底放弃赶超战略, 改变对基层干部的考核体系, 是至关重要的。所幸的是,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已经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标准。这些发展理念的确立, 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 中国的地方政府保

护和市场分割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樊纲，王小鲁（2001），《中国市场化指数》，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黄季焜，Scott Rozelle，解玉平，张敏（2002），“从农产品价格保护程度和市场整合看入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管理世界》，2002年第3期，第84-94页。

李剑阁（2003），“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载于《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145页。

李善同，侯永志，刘云中，陈波（2003a），“中国国内地方保护的调查报告——基于企业抽样调查的分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专刊第六十五号。

李善同，侯永志，陈波（2003b），“中国国内地方保护的调查报告——非企业抽样调查结果的初步分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总2042号。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林毅夫，刘培林（2001），“自生能力与国企改革”，《经济研究》，2001年第9期，第60-70页。

林毅夫（2002），“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经济学（季刊）》，第一卷第2期，第269-300页。

刘明兴（2002），“中国各省1970-1999经济增长数据”，<http://jlin.ccer.edu.cn/article/article.asp?id=100>。

刘培林（2004），“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损失”，未发表。

平新乔（2003），“政府保护的动机与效果——一个实证分析”，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内部讨论稿，No. C2003032。

吴敬琏（2004），《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1月版。

郑毓盛，李崇高（2003），“中国地方分割的效率损失”，《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第64-72页。

各省区统计年鉴。

Bai, C. E., Du, Y. J., Tao, Z. G. and Tong, Y. T., (2003), “Local Protectionism and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Industries”, *William Davidson Working Paper 565*.

Gluschenko, Konstantin (2003), “Market Integration in Russia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Years”,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1 (3), pp. 411-434.

Harberger, A. C. (1978), “Perspective on Capital and Technology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in Artis, M. J. and Nobay, A.R. (eds), *Contemporary Economic Analysis*, Croom Helm,

15-42.

Henderson, D. I., and R. R. Russell (2001), “*Human Capital and Convergence: A Production-Frontier Approac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Working Papers.

Naughton, B. (2003), “ How Much Can Regional Integration Do to Unify China’s Markets?”, in Nicholas Hope, Dennis Yang, and Mu Yang Li, eds., *How Far Across the River? Chinese Policy Reform at the Millenniu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04-232.

Park, Albert, and Yang Du (2003), “Blunting the Razor’s Edge: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Reform China”, *Mimeo*. Hong Kong.

World Bank, 2002, *Transition: The First Ten Years-Analysis and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Young, A. (2000), “The Razor’s Edge: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4), 2000, pp.1091-1135.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中文讨论稿系列

目 录

No.C2004015	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从发展战略的角度考察林毅夫 刘培林
No.C2004014	金融创新与长期经济增长..... 施建淮
No.C2004013	中国城市居民预防性储蓄及预防性动机强度：1999-2003 施建淮 朱海婷
No.C2004012	通过公共产品的供给调控房地产市场.....汪 浩 王小龙
No.C2004011	从 2000 人口普查看我国家庭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 曾 毅 王正联
No.C2004010	以晚育为杠杆，平稳向二孩政策过渡.....曾 毅
No.C2004009	我国长期米价研究（1644-2000）.....卢 锋 彭凯翔
No.C2004008	连锁超市“通道费”..... 汪 浩
No.C2004007	东亚金融货币合作：短期，中期和长期.....施建淮
No.C2004006	产出不确定，信息不对称与双重危机发生机制 施建淮 郭美新
No.C2004005	产品内分工：一个分析框架.....卢 锋
No.C2004004	信用体系、金融改革与中国经济发展.....林毅夫
No.C2004003	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布的变化：1988-1999万定山
No.C2004002	与林老师对话：经济学方法论篇.....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No.C2004001	融资、地价与楼盘价格趋势.....平新乔 陈敏彦
No.C2003033	要素禀赋、专业化分工、贸易的理论与实证： 与杨小凯、张永生商榷鞠建东 林毅夫 王勇

No.C2003032	政府保护的动机与效果——一个实证分析平新乔
No.C2003031	“柳暗花明之路”还是空中楼阁？ ——就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改革方向与汤敏博士商榷陆挺
No.C2003030	我国农产品贸易趋势和结构变动.....卢锋 雷蕾
No.C2003029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林毅夫 李志赞
No.C2003028	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兼评《对外开放新时期的对外贸易战略与贸易政策评论》林毅夫 孙希芳
No.C2003027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林毅夫 李志赞
No.C2003026	金融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林毅夫
No.C2003025	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林毅夫 孙希芳
No.C2003024	与林老师对话:发展战略篇之三林毅夫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1 级研究生
No.C2003023	与林老师对话:发展战略篇之二林毅夫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1 级研究生
No.C2003022	与林老师对话:发展战略篇之一林毅夫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1 级研究生
No.C2003021	假冒生产对专利制度的伤害.....平新乔 尹静
No.C2003020	中国地区(制造业行业)间的技术溢出分析.....尹静 平新乔林毅夫 刘培林
No.C2003018	银行监管的七大政策及其有效性.....张俊喜
No.C2003017	从中国农民医疗保健支出行为 看农村医疗保健融资机制的选择.....平新乔
No.C2003016	中国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估算.....平新乔 范瑛 郝朝艳
No.C2003015	再谈卫生保健市场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海闻 王健 赵忠 石光
No.C2003014	退耕还林:私人承包与政府规制.....王小龙
No.C2003013	俄国学界评林毅夫,蔡昉和李周著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Vadim Shabalin,D.Sc Yakov Pevzer
No.C2003012	跨界治理:台资参与昆山制度创新的个案研究柏兰芝 潘毅
No. C2003011	工资合约,灰色收入和职业生涯考虑.....范瑛 平新乔
No. C2003010	农村卫生服务体系探讨海闻 王健 陈秋霖 赵忠 侯振刚
No. C2003009	中国能否通过在农村创造非农工作职位 来转移大部分农业劳动力.....D. 盖尔 约翰逊
No. C2003008	政策性负担与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林毅夫 刘明兴 章奇